

新生代小说系列

太阳很好

何 顿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新生代小说系列 主编 李师东

太阳很好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阳很好/何顿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1

(新生代小说系列)

ISBN 7-80120-072-1

I. 太… II. 何…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选集②短篇小说-中国-当代-选集 IV. ① I 247.5② I 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5) 第23552号

太阳很好

著 者/何 顿

责任编辑/王 勇

封面设计/李志国

版式设计/王 勇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1字数/249千

版次/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地址:北京朝阳区西坝河

邮政编码:100028

东里77号楼底商5号

ISBN 7-80120-072-1/I·8

定价:14.20元

总 序——

一个新的文学层面的诞生

李师东

进入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一群具有实力和锋芒的青年作家走上了文坛。当我们还来不及作出应有的心理反应时，这一茬人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似乎显得是那么突兀，那么不可思议。但是更多的读者发现，他们把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表现得更直接了些，把我们正在发生的心理传达得更贴近了些，把我们这个时代的遭遇、情绪和精神处境表现得更准确、更率直、更真切了些。人们有理由这样认为，他们是一群与我们的时空同步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是九十年代的一道新的文学景观；而他们的出现，也正是一个新的文学层面的诞生。

这就是这样一茬人，一茬在六十年代前后出生、九十年代在文坛上出现的新生代作家们。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作家，或一茬作家的出现，与当下的创作态势、文化处境和精神遭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往往就构成了他们存在的秘密和发展的前提。如果说，在八十年代或更早出现的作家们，是带着思考各自话题的习惯和寻求新的变化的愿望，而走进九十年代的话，那么，新生代作家及其作品，则无疑是文学进展到九十年代时的最新成果。准确地说，他们正是九十

年代的产物。在九十年代新的时空下,这一茬更为年轻的青年作家得以走上文坛,正在于他们明显疏离了前几茬作家习惯关心的话题,而与社会的新的变化和进展保持了同步相向的趋势,这也是他们能够脱颖而出,并正在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的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八十年代的文学,是以对表现疆域的拓展和掘进、对表现手段的探索和实验为其显著特征的。与前几茬作家相伴随的是冲突和对抗、肯定和否定、张扬和摒弃、试验和沿袭、超前和滞后、创新和守成、反叛和建立等源远流长的话题。直至今今天,我们仍然能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感受到来自不同思想观念、文化背景的冲撞和对举。这是一个不断被文学创作中的风、热、浪、潮所裹挟着、同时又不断地试图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化过程。而我们所说的六十年代前后出生、九十年代走上文坛的新生代青年作家,则明显缺少这一方面的文化经历和精神遭遇。他们得以能从旁观者的姿态去面对这一切,去看待这一切,而保持清醒的认知。这种高蹈的姿态,决定了这一茬青年作家的新的文学属性,在这一茬作家的创作中,被前几茬作家所看重的,往往是他们的不经意之处;而为他们所重视的,又往往是前几茬作家的经历所不逮的;同时,前几茬作家所创造的思想和精神成果,正是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起点和前提。——文学的主题就是这样在他们这里得到了理所当然的传承、接替和变异。

因此,把个人的情绪和遭遇与时代的生活面貌和精神处境勾连在一起,谋求与九十年代社会的契合,体现中国社会新的进展,这正是他们的文学努力。以一种消解的姿态,达到对文学的整合,以反先锋的方式,回归到朴素的情感状态,以个人化的方式,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这正是这个新生代作家群的文学用

心。

一茬人有一茬人的生活遭遇和精神处境，一茬人有一茬人的情感内容和表达方式，一茬人还有着自己难为他人所能道出的生存秘密。更何况，这一茬作家站在世纪之交的边缘上，他们注定是要走向一个新的世纪的。他们的感触、他们的体验、他们的思想就有着更为生动更加特别的内容。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必将在人们的心灵史上留下深刻难忘的精神印记。而这一茬青年作家的创作实践，也将焕发出特殊的艺术魅力。

而且，从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锐气和活力。他们还来不及重复自己，还来不及建立自己的套路和模式，而更多是以自己质朴的感受和年轻的体验在展示给人们。因此，他们的作品带有着一种鲜活，一种清新，一种无拘无束，而这正是我们的文学创作所应该珍视的活力。毫无疑问，他们给文坛注入了一种生气，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不足。他们还来不及拥有更为丰富的人生体验，但是他们在与文学一起成熟。关注他们，就是关心我们的文学的现在，就是对我们的文学的新的发展所应该保有的的一份必然的信心。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作出了策划这样一套丛书的考虑。感谢中国华侨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实现这一想法的机会，也感谢收入这一丛书或暂未收入这一丛书的新生代作家们的支持和同龄的批评家们的协助。

目 录

总 序：一个新的文学层面的诞生 … 李师东(1)

无所谓…………… (1)

太阳很好…………… (103)

跟条狗一样…………… (181)

金匕首…………… (239)

告别自己…………… (263)

跋：回到生活现场的叙事 …… 陈晓明(335)

无所谓

火葬场的殡仪馆里有一种肃穆和阴森的气味。哀乐从八个大喇叭音响里飘出来，嗡嗡嗡一片，跟一群蚊子一样到处乱飞，从我们脸上掠过，飞入了蓝蓝的炎热不堪的天空，向火葬场外面的马路上飞去。我跳下“的士”，寻着这片哀乐声走去，大步走进了殡仪馆。我同学李建国的追悼会尚未开始，但大家都木木地站着，个个心事重重地等着开追悼会，都把视线落到了灵堂上挂着的死者的照片上。照片上李建国的面孔看上去只是个20几岁的青年（实际年龄已35岁了），方方正正的额头方方正正的脸，唯有鼻子显得不够景气（比较其它眼睛嘴巴来略嫌短小了点）。我的几个大学同学见我来了，只是用点头的方式默默地打了下招呼，表示心情都很沉痛。站在我一旁的同学名叫刘小平，他轻轻拍了下我的肩膀，压低声音对我说：“每个同学凑1百块钱。”我忙从银利来衬衣口袋里扯出一张1百元的钞票递给他，刘小平拿着钱，对我沉重地一笑，走开了。

追悼会开始了。死者的妻子由我的一个女同学和刘小平的妻子搀扶着走了出来，她的脸十分浮肿，眼睛哭得像两只水蜜桃，人也变丑了。李建国是我们大学时代的班长，他身上的许多

优良品质在大学4年里一直照耀着我们。我们原以为他将来是要当省长的，然而这个“省长”却先一步离我们而去了。开追悼会和追悼会结束时，许多同学都流了泪，尤其是几个女同学，眼睛哭得同小水蜜桃似的。我是两个没有掉泪的男同学中的一个，另一个是自告奋勇地作悼词的同学，名叫王志强。王志强是这样作的悼词：“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女士，今天，我们沉痛又沉痛地哀悼李建国同志。李建国同志与世长辞了，但是我们无限怀念他……”王志强没法流泪，因为他得绷着面孔一本正经地致几个同学昨天晚上集体讨论的悼词。我没有掉泪不是因为我不悲伤，而是因为我有10年没哭过脸了，我脑壳里那根牵动泪泉的神经业已枯死了。我看着几个女同学哭得那么真切，自己很想挤几滴眼泪出来，以示自己也确实忧伤，但是没有成功。我只好先一步走出来，故意站在8月烤人的大太阳下，好让同学们觉得我已痛苦得怕太阳晒了。我是真痛苦，李建国是我们长沙师范学院音乐系80级的班长。在我读大学那4年里，可以说在很多方面身为班长的李建国都关照过我。我读大学3年级时，曾谈过一个姑娘，这个姑娘由于常常来找我学唱歌，于是李建国也认识了她。但我没同这个姑娘好多久，我们闪电似的恋爱，自然又闪电似地终结了。这个我现在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的姑娘认为我欺骗了她，于我们关系结束后的某一天，毅然来到了学校，要找系领导反映情况，要害我身败名裂。但是那天我运气好，她横着一颗心来到我们系里，碰到的第一个人却是我们班长李建国。我现在一点也不清楚她和李建国是怎样进入这种谈话的状态的，但是李建国力挽狂澜使我免遭名誉扫地这一事实却让我终生铭记在心；那天傍晚，班长李建国坐在学校球场边的一块预制板上，手里端着一碗饭，特意等着我。我端着饭，迎着夕阳慢腾腾地走到

球场旁时，李建国叫住了我。“罗平，”他说，对我招了招手，“你过来，我跟你说件事看。”我走了过去，他就同我说了那个姑娘要到系领导那里控告我欺骗她，玩弄她的事情。“我劝你自己赶快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他说，“她告到系领导那里，那就讨嫌了。这样的事情让系领导晓得了，无论怎样都对你不利。”我当时一脸通红，我没想到身为班长的李建国，可以这样为我作想的处理这种事情。我红着脸替自己狡辩说：“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只是比一般关系稍微深一点。”李建国一摆手，“我不想知道你们之间的故事。你只注意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你想和她分手，也要慢慢来，让她心理上有个适应过程。”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姑娘的模样早已从我记忆的宝库中清理出去了，就跟清仓查库一样，扫地出门了。但这件事情过去10年了却仍在我心上放着，直至今今天，我站在殡仪馆前哀乐飘扬的大太阳下仍然想起了这件事。

我想哭。

“罗平，你站在太阳下做什么？”王志强走出来提醒我说，“到这边来喽。”

这个在李建国的追悼会上作悼词的王志强，大学毕业后只工作了2年还不到的时间，就离开了单位，和他妻子的哥哥扯上了香港关系，办了家专做湘绣机绣产品出口的贸易生意。在我的大学同学里他是最富有的，脸上都富有得流油了。他站在一棵高耸入云的玉兰树的阴影里，接受着从坟山那边刮来的东南风的抚慰，却仍一身黑汗水流的。“你站在太阳下晒潮气哦？”他对我淡淡一笑。“好热。”

我接过他递给我的万宝路烟，点燃，深深地吸了口，瞥了眼黄灿灿的太阳。“今天好像没有昨天热。”我说，“昨天热得人都想自杀。”

“昨天只有 38 度，今天至少是 39 度。”他讲事实道，“你看哪天热些？”

这时刘小平走了过来，10 年前他是我们 80 级音乐班的学习委员。毕业时他留校任教，92 年就评了副教授，这主要是他写了一篇风马牛不相及的什么“民间音乐的哲学思想”，发在一个带权威性的音乐理论刊物上。据他自己吹牛说“马上就翻译到了国外”。在我们看来，他的那些所谓思想，是强加到音乐上去的，就像一个人脱了裤子打屁，多此一举。然而，这篇被前班长李建国形容为“牛胯里扯到马胯里”的文章，却让他前年破格提升为副教授了。为此，刘小平拿着这篇文章到处招摇，以显示自己不但会唱歌，而且有思想自居。“我最近在写一本‘音乐的形而上学’，他将是一本全中国没有人写过的书。”2 年前他曾这么骄傲地对我 and 李建国海道。那是 5 月的一个周末晚上，我们在李建国家里吃的晚饭，晚饭后，我们三人坐在李建国家院子里的葡萄棚下，透过黑乎乎的葡萄叶，望着昏暗的天空和一轮椭圆和苍白的月亮时，他突然情不自禁地告诉我和李建国说。李建国不为他的文章所动道：“你写完，变成了书，拿给我们看再说。”现在李建国已烧成了灰，但那天晚上三人谈话的情景，却在我记忆的仓库里很好地存放着。“刘小平，”我对走过来的他说，当然是忽然想起的，“你那本‘音乐的形而上学’早已出版了吧？”

“还没写完。”刘小平对我笑笑说，“题目太大了，写起来很困难。现在丢在一边没写了。我会要把它写完的，大学里面，非得有一本书才能评正教授。”

“你这号教授做好事。”王志强不屑道，“我们还不晓得你那本经！”王志强说话的语气再明白不过了，那就是，他那点水平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

刘小平淡淡地笑笑，没有同我们 80 级里出的这个“资本家”争论。这时，那个搀扶着李建国的遗孀的女同学头发乱蓬蓬地也走了过来。她的两只眼睛哭得同樱桃样的了，眼白红红的，像患了红眼睛病一样。她个子不高，穿一件看上去就热的金黄色的连衣裙，一张有些雀斑的脸红灿灿的显得更雀斑了。那是眼泪水腐蚀成这样的。“张映，”刘小平同她说话道，“很感动呢，看见你是那样哭。”

“你就是这样的罗。”张映指出说，眼睛又湿了，“你们男人坚强些。”

“我也很软弱呢。”王志强说，“我只想哭，不骗你，张映，我对李建国很有感情。你怕就是你一个人对他有感情！我可以说，全班同学都对他有感情。”

张映的眼泪水又流出来了。她为了使自己做到不在同学们面前哭，就拼命抿着她的两片嘴唇，为此她的两片枣红色的嘴唇，在她那张有些雀斑的烂苹果一样的脸上发奋地痉挛着，很让我们又产生辛酸的感触。

张映在大学里的时候，很爱班长李建国。这不奇怪，因为李建国那时候，在全班 14 个男同学里显得格外出类拔萃，脸上有一种高我们全体男同学一等的伟人的气质。这位心怀世界腹有良谋的李建国，一开始就体现出他为人的博大和兄长般的忍让。记得大学 1 年级的那个元旦前夕，一个同学在寝室里提议元旦晚上包饺子吃，全班同学当然就举双手地坚决响应，欢呼着推出班长李建国指派工作。于是第二天就忙碌起来了，有的去买灰面，有的去买肉和小菜，几个同学又忙着去老师家借这借那。大家忙碌了一下午，饺子自然就出来了。全班 25 个同学聚集在教

室里，骄傲地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果实，一个个狼吞虎咽，唯有李建国一个人在煤灶旁忙着，什么也没有吃。不是他不想吃，是临了饺子没有了。“李建国还没有吃的。”当吃了还想吃的王志强贪婪地走上去，把最后几个饺子舀进自己的饭碗里时，张映尖嚷一声道。王志强想把饺子退出来也迟了，因为饺子已经进了他那只留有他口水的汤碗里了。李建国有点难堪地笑笑，“我没有关系。”他说，“我不怎么喜欢吃饺子。我等下到外面吃碗面就行了。”李建国完全可以先吃，他站在火炉边上，饺子都是他守着煮熟的。但他就同24个同学的哥哥一样，先让我们吃。当时我们并没有感觉到他的美德，只是为他没有吃到饺子而有点同情他。“寅次郎，你好讨厌的。”读大学时，王志强的名字叫“寅次郎”，我谴责王志强说，“把班长的饺子都吃了。”王志强声辩说：“我以为大家都吃了。”王志强有理由声辩，因为他是后来的，他确实不知道班长没有吃饺子。他以为锅子里的饺子都是留给他一个人享用的，他到一个老师家有些事情去了。李建国摆摆手说：“我吃不吃无所谓。等下我去吃碗面就可以了。”

李建国在很多方面都比我们站得高。有次我、刘小平和他，三人去看电影，那是晚上。那时候电影还很能牵动人们心里的那根多余的情丝，人们的注意力还很盯在银幕上，把剩余的感情和多余的精力倾泻到银幕中的人物身上，当然只要有新影片上映就很俏。一到晚上电影院门前就门庭若市，挤破脑壳。我还记得那部影片的名字叫“远山的呼唤”。王志强先睹为快地看了，回到寝室里深有感触地说这是一部非常动人的故事片。“是杜丘演的主角。”王志强介绍说，“绝了。”杜丘就是高仓健，杜丘是高仓健在“追捕”中饰演的一个被陷害的检查官。他脸上的刚毅折服了广大观众，自然也使我们这帮大学生信服。“去看不？”刘小平冲

动地望着我和李建国。“要看晚上就去看。”于是吃过晚饭三个人就匆匆去了。一公共汽车搭到了湖南剧院门前。湖南剧院门前黑压压一群人，不少票贩子手上拿着当晚的电影票，嚷道：“要票不票不？2元钱一张。”原票价只要1元2角一张。我们当时是口袋布贴布的大学生，每分钱都得从父母口袋里去掏，只好到人挤人的售票窗口去拼力奋战。这个走上去奋战的人理所当然的是李建国。他的个子天生比我和刘小平高，身材也是伟人般魁梧，而且他向来不计较自己的力气。他挤了进去，买了3张位子很差的票走了出来，“没有好位子。”他把票给我们看说。我和刘小平站在行人道的一棵法国梧桐树下，看着他去汗臭屁臭充斥于四周的人堆里奋力拼搏，自然没有资格嫌票的位子不好。三个人走进电影院看完电影走出来，挤上一辆公共汽车时，他抢占了一个可以坐两个人的座位，他自己却不坐，硬让给我和刘小平坐。刘小平大大方方地坐了进去，我却看出了李建国的好心而不好意思道：“你坐你坐。”李建国说：“你坐，我喜欢站。”这个喜欢站的青年一到寝室里就躺下了，就捧起枕头边的一本书看，显得很抓紧时间，时不时也插进话来和我们聊几句电影，接着又把视线放到他手中的一本什么书上。

李建国是凭着手中的一支竹笛踏入大学门坎的。1980年6月里的一天，身为工人的李建国身穿一套灰色的四个口袋的干部服，手中攥支竹笛步入长沙师范学院的音乐考场的当儿，我正攀着窗户的铁护窗对里面张望。我刚刚考完，我是考声乐。我那天唱的歌是“红星照我去战斗”：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什么的。唱完之后，几个考官脸上都很平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那种内容。因而我很不踏实地站在窗外等待，很想看看别人的水平。李建国把笛子一举，“我是一个兵”这支欢快的笛子独奏曲

就很军人且感情充沛地传入了我的耳孔。这支笛子独奏曲从他手中的笛孔里送扬出来并结束后,我看见那个年纪大点的主考官对他轻轻一笑,问他说:“你吹笛子有几年时间了?”“我12岁就开始吹笛子。”李建国望着主考官说。主考官又微微一笑说:“回去准备你的文化成绩吧。”李建国走出考场时,我情不自禁地走了上去。“你的笛子吹得相当可以。”我那时并不认识他,但我却视他为同道地对他说。李建国对我一笑,“吹得不行。”他谦虚说。我说:“你真的吹得好。”李建国瞥着我,转移话题说:“你是考什么?”“声乐。”我说,“不过我没有在家里唱得好。我唱歌时太紧张了,声音没有放开。”我说完递了支烟给他,李建国点燃了,不是很会抽地吸了口,烟只是在口腔里打个转身就“叭”了出来。我记得那是落了十几天雨后的第一个晴天,太阳苍白的,没有6月里应有的温度。大地上生气盎然,树木都很绿。我抽了口烟,因为两人都不熟,但一支烟又暂时把我和他牵在了一起,我就找话说:“你今天好大了?”“21岁。”他望着我说,“你呢?”“20岁。”我回答说。事实上我与李建国于进大学门坎的前几个月便在考场外面相识了,只是那天尚未互道姓名。李建国凭着手中的笛子踏进了大学,但他并没打算在大学里把笛子进一步发扬光大,恰好相反,李建国的骨子里是蔑视手中的笛子的价值的,能在社会上站起来,找到尊严和价值的,在李建国心目中就只有政治。李建国于1977年高中一毕业就急着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在知青点连续参加了3次高考,即77、78、79年的高考。不过这3年的高考里,他的志向不是吹笛子,而是向往考北京大学,因为他的外公告诉他说,北大是革命家和政治家诞生的摇篮。李建国的志向就是越过北京大学的门坎。然而他不可能越过,他读高中的时候太没读书了。文化革命的10年里读初高中,学习名义

上是摆在首位,其实是摆在次要得令人不屑一顾的位置上,学工学农,唱歌跳舞,不读书的空气整个就把我们那代人吞噬干净了。李建国读高中时就是学校团委里的主要骨干,又是校文艺宣传队里不可缺少的一支笛子,还是足球队的中锋主力。比赛、演出和校团委的宣传活动瓜分了他大量的学习时间。虽然他在知青点时,拼命努力,企图越过一切障碍,跨进北京大学的校门,但是不行,他的数理化底子太薄了,使他面对着考试卷子不知所云。1979年底,他招工进一家远在郊区的工厂后,只好改了进军北京大学的“大志”,拿着一支笛子(并不是自己的)走进了师范学院的大门。“我外公说吹笛子没用。”李建国一天对我们不屑于他的专业说。弹钢琴的刘小平后来去捉摸音乐和哲学的关系,就是深受他思想的影响。王志强大学毕业后,索性把音乐专业完全彻底地抛弃也是受他影响所致,认为音乐对社会对自己都没用。“我外公说,唱歌跳舞在旧社会是没人看得起的。”李建国平静地告诉我们说。说老实话,这在当时很有点打击我们学习的积极性。李建国的外公是孙中山先生宣扬的三民主义的至死不渝的追随者,解放前是湖南省政府国民党的要员,1949年跟随国民党元老程潜和陈明仁将军在长沙起义,解放后属于共产党的统战对象,文化大革命中却被造反派整得不亦乐乎,他老人家临终时用毛主席的语录(他把身为外孙的李建国唤到身边)语重心长地教育外孙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李建国的外公寄托的希望,当然不是希望他很看重的外孙坐在屋里吹笛子,而是希望他成为一名“长大了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政治家。李建国的外公只有一个女儿,自然就只有这一个一脸方正正的外孙,李建国希望从政的兴趣就是来源于他外公的思想。

我们那个时候看的不过是音乐欣赏方面的书和8小时之外之类的杂志,李建国却是啃我们一拿起就要睡觉的柏拉图、叔本华、康德、尼采等等哲学著作。他看得津津有味,还做学习笔记。

有一天晚上,他端端正正地坐在桌前阅读一本尼采的著作“悲剧的诞生”,忽然就拿起几张废纸往厕所里奔去。我睡在他的上铺上,我见他刚才一个劲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就弯下身,伸出手拿着他那本蓝塑料壳面的笔记本看。我只记得那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尼采我向你致敬。”李建国解完大便,走回来见我在看他的笔记本(他的笔记本经常是封锁在自己抽屉里秘不示人的),脸上就有些不悦道:“拿来罗。”我还想看,他却伸个手来把他的笔记本抢了过去。“别人的东西最好不要看。”他说。我望着他,“建国,尼采是谁?”我说。我那时候基本上不看什么哲学书,我们那时的哲学课里只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最多提到过几次康德和叔本华,那也是从反面教材的角度提出来进行批判的。坐在桌前看一本8小时之外的王志强也抬起头看着他说:“什么尼采?”王志强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位对希特勒影响极深的尼采。那时的王志强只知道唱歌唱得好好的是胡松华,弹钢琴弹得好好的是刘诗昆,也许还有一个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唱出了名的蒋大为。当然他还知道晚上睡觉前洗个冷水脸,可以使皮肤保持光洁;还知道先一天晚上打上皮鞋油,第二天早上用穿烂了的尼龙袜子去擦,这既能滋润干燥了一天的皮子又能使皮鞋光亮。但是他也不知道尼采。“尼采是德国的一个哲学家。”李建国一副沉着稳健的模样回答我们说,“希特勒只崇拜一个人,就是尼采。希特勒用尼采的思想武装他的党卫军,指使他们去杀犹太人。”“为什么?”我很感兴趣地问他,因为他提到了我们